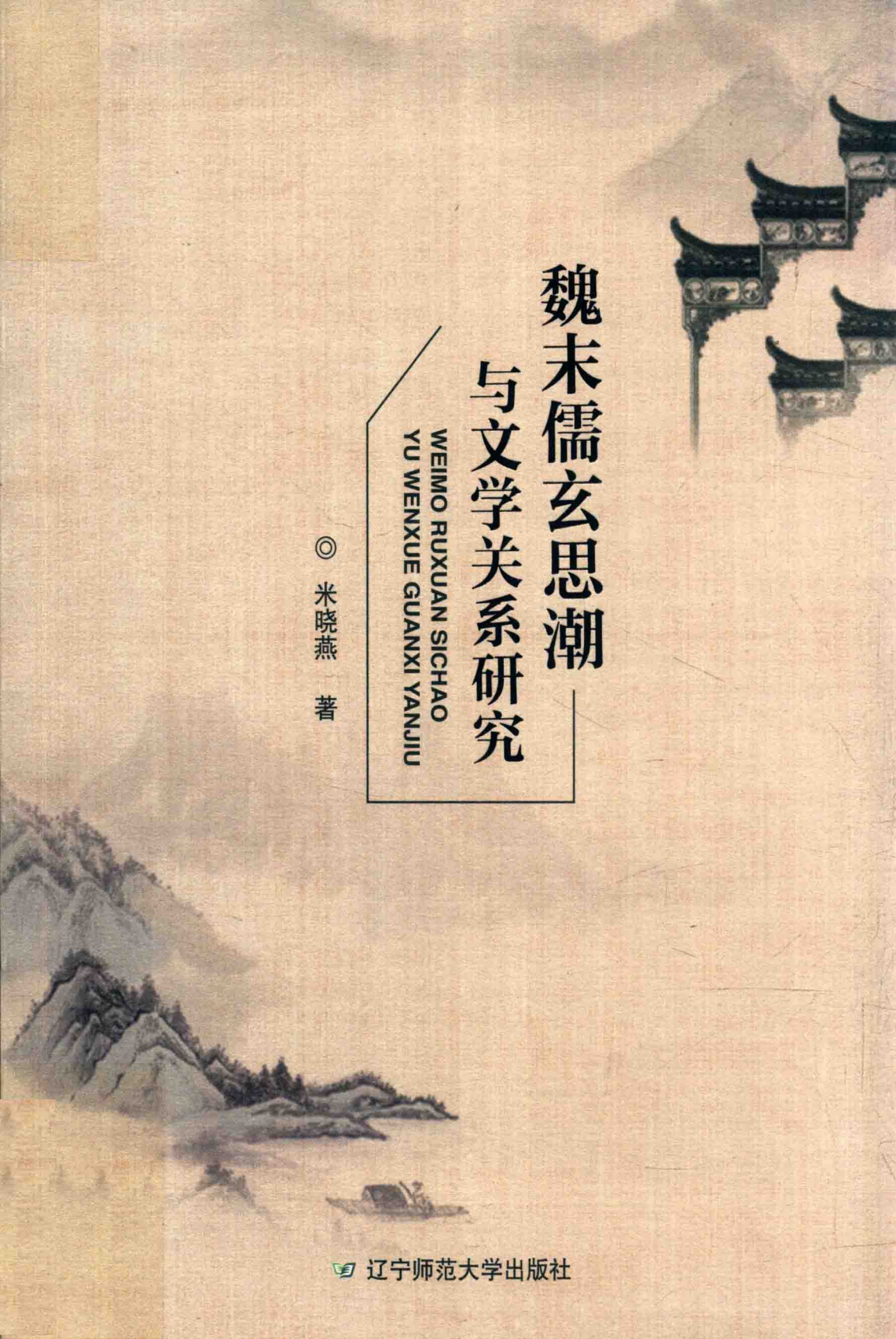




魏末儒玄思潮 与文学关系研究

WEIMO RUXUAN SICHAO
YU WENXUE GUANXI YANJIU

◎ 米晓燕 著

魏末儒玄思潮

与文学关系研究

WEIMO RUXUAN SICHAO
YU WENXUE GUANXI YANJIU

◎ 米晓燕 著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 大连 ·

©米晓燕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末儒玄思潮与文学关系研究 / 米晓燕著. — 大连 :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652-2098-2

I. ①魏… II. ①米… III. ①儒学—关系—建安文学—
古典文学研究②玄学—关系—建安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B222.05②B235.05③I209.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2084 号

出 版 人:王 星
责任编辑:阎莉颖
责任校对:韩福娜
装帧设计:郭 靖

出 版 者: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大连市黄河路 850 号
网 址:<http://www.lnnup.net>
<http://www.press.lnnu.edu.cn>
邮 编:116029
营销电话:(0411)84206854 84215261 82159912(教材)
印 刷 者: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170mm×230mm
印 张:14.5
字 数:220 千字

出版时间: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52-2098-2

定 价:29.20 元



本书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BENSHU YOU DALIANSHI RENMIN ZHENGFU ZIZHU CHUBAN

本书由
辽宁师范大学
学术专著资助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

BENSHUYOU
LIAONINGSHIFANDAXUE
XUESHUZHUANZHUZIZHUCHUBANJIJIN
ZIZHUCHUBAN





序

东汉末年，儒教呈没落之势，所谓“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鱼豢《儒宗传序》）；至三国分立，曹魏主导中原文化，也不以儒教为然，“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傅玄《举清远疏》）。正始年间，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形成了，这就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融会儒家思想的玄学。“玄”，取《老子》首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意，玄学主张以“玄”来统摄世界，当时把《周易》《老子》《庄子》称为“三玄”。玄学，以何晏、王弼为首倡，檀道鸾《续晋阳秋》说，“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即是此意。王弼创立了一整套玄学理论，何晏则以其权势地位来推广玄学，《世说新语·文学》即称，“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座”；《文章叙录》也说，“（何）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玄学大师王弼也是何晏一手提拔起来的。文学史常常大而化之地说，玄学在正始年间（240—249）兴起，至两晋时愈演愈烈，弥漫社会，直到南朝，风气才有所扭转；人们往往忽略了魏末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即正始到西晋建立，玄学蔓延却遭到司马氏的迎头一棒，司马氏因为出身关东世族，笃信儒教，尽管精于权术，但每每以儒家礼教相标榜，对思想的控制反而更加严格，这就使儒、玄之争也成为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本处于社会文化主流的玄学从正始“高平陵事变”后，遭受司马氏的残酷打压，“天下名士减半”指的就是玄学人士。米晓燕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儒、玄彼此间的或消或长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如此的研究，得出儒、玄相争而又“儒中有玄，玄中有儒”的结论，剖析了在如此的儒、玄相争相合之中所产生的文学史现象。使我们认识到文学史发展的规律之一，即不同哲学思想影响下的统治阶级思想对文学来说，其发展是既方向各异又万变不离其宗的；使我们

对阮籍、嵇康及当时士人思想、品行的建构与冲突的认识形成了新的视野。

米晓燕在硕士阶段是做阮籍诗歌研究的，一般人在博士阶段的论文选题，或是改换硕士时期的研究对象，或是接着做，米晓燕选择了接着做。米晓燕从研究阮籍到研究嵇康，到研究魏末这一段文学史，再从影响着这一段文学史的社会、政治、学术反观文学，把文学放在历史的各个方面之中来研究，这样的文学研究方法应该是值得提倡的；同时，其文学史研究的结论不是干瘪的、片面的，而是丰满的、较为全面的，使读者对那段文学史的认识更加立体化，这也证明米晓燕的文学史研究的路径的实用与可靠。

我1990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至今已有二十四个春秋了，这两天2014级硕士新生刚刚入学，连这一届，我就总共带了六十多名硕士了。我自2007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连外国留学生算在一起，至今也招收了二十多名博士生了。此中，硕士与博士都跟我读的，先后只何水英、米晓燕两位女弟子，何水英研究《文苑英华》，其博士论文尚未出版，她博士毕业后继续研究《文苑英华》，已经以《文苑英华》为对象获得了教育部的课题；米晓燕的博士论文在充实以后送交出版社，盼我作序，我作为她的硕士导师与博士导师，义不容辞；看到弟子的辛勤劳动成果即将面世，十分高兴，手为心使，欣然提笔，谨为小序，于甲午年秋日。

胡大雷



前言

文学演变与政治动向和思想变迁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晋文学亦是如此。建安文学，于社会动乱之际，或以昂扬振奋的精神，发出了统一天下的时代强音；或以流连诗酒的宴饮，表达了纵酒欢歌的情谊和时光易逝的悲慨。正始文学，在权力斗争政治更迭之际，政治上采取避世的态度，精神上崇奉老庄的放旷，从而寄希望于全身远祸。太康文学，则是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潜伏着社会的危机，既有身处盛世从容论文的闲情，又有面临危机的苦闷。此后的元康文学产生于社会再次动乱之际，文人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只好或隐居或佯狂以求幸免于难。而东晋文学，则在偏安江左自得其乐的生活中，表达着对山水的体悟和对哲思的执着。因此，对于这些文学现象的考察，都不能脱离时代、脱离政治、脱离思想来进行。

魏晋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政治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探讨，也成为魏晋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陶东风认为，“20世纪后半期风行世界的文化研究强调的则是社会政治而不是党派政治。社会政治关注的核心是人际间存在的权力关系，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是无所不在的，可以说在凡有人际关系的地方就必然有政治存焉。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那么当然无所谓政治问题，但只要有两个人以上的人存在就必然存在权力关系，从而也必然存在政治。西方的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显然文学必然具有政治性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的意义上说的”^①。孙明君在《汉魏文学与政治》一书的序言中，总结了历来学者们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两个观点：一是认为文学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从属于政治并且应该为政治服务；二是文学与政治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文学不必服从于政治并且没有必要去为政治服务。凡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已经丧失了文学自身的审美功能。对于

① 陶东风：《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思考》，《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



这样两种观点，孙明君总结为：“不论是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也好，还是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也好，绝大多数士人的心中都有难以消解的政治情结。”文学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文学研究中，如果绕开了社会政治，避而不谈社会政治，就无法真正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在意蕴和艺术精神。”^①

魏末正始时期（以下简称“正始”），无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当然，思想史上关注的正始与文学史上关注的正始，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思想史上关注的正始，看重的是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的玄学的兴起，其时段更接近于历史上的正始；而文学史上所谈的正始，则更多地偏重于指向正始之后的历史时段，是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但思想史和文学史上谈论正始，也有其一致性，即都强调玄学的兴起对于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的主导影响。将玄学视为正始之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指导思想，这种认识是普遍的，由此就将文学研究的重点也转向分析文学与政治及其与玄学思想的关系。但是考察历史，就会发现这样的理论预设不仅是粗疏的，也是不准确的。

实际上，魏晋时期儒学与玄学的关系不仅仅是交互更替，而且也存在着并行的状态。其间此长彼消的起落和融合，也并非只经历了一个回合，而是有着非常复杂的过程。

东汉中叶，皇权削弱，外戚宦官轮流执掌政权，加之两次党锢之祸，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或是进身无路，或是遭到清洗，尽管有些人仍然保留着倜傥之风，但整体上士风大为衰退。黄巾起义以及由之而起的军阀混战，使得政治的大一统土崩瓦解，儒学在思想领域的大一统局面也发生了动摇。曹氏出身卑微，不仅为宦官后代，而且三世立贱，对正统儒学并不尊重，带头蔑弃礼法，结果使得曹魏政权统治下的思想状态比较宽松。而司马氏则因为出身关东世族，笃信儒教，尽管精于权术，但每每以儒家礼教相标榜，对思想的控制反而更加严格。这就导致玄学并非从正始年间兴起之后就一直处于社会文化的主流，其实它是在司马氏政治的打压下，经过了三十年潜滋暗长，到西晋后期随着皇权的再次失控，

^①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9、17页。



才喷薄而出，成为元康、永嘉以及此后东晋的主流思想。

这一时期儒玄思想的互相消长，自然影响到文学的创作，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复杂而多变的特征。文学主题、文学情感、文学表达、文学体裁都出现了很多新变，魏末文学在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思潮作用下，表现出既继承建安文学风骨，又开启西晋文学繁缛之风的文化特征。因此，对于正始文学的研究，就不能单纯从玄学思想的一面、从“竹林七贤”放诞不羁的举止出发来加以探讨，而要从曹氏政权与司马氏政权的斗争、从儒学与玄学思潮的共生与消长的角度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样才能避免单一维度的失于偏颇的论述。只有对那一历史时段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符合历史的具体分析，才能够对当时的文学现象做出合乎历史和文化的解释。

三国时期的魏国，从齐王曹芳正始元年（240）开始，到晋武帝司马炎建立西晋的泰始元年（265），处于政治动荡的时期。在变化与动荡中，敏感的文人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或隐于山水市井悠游归避。政治与思潮影响到这一时期的每一个文人，他们的生活、行为、作品，无一例外地都打上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烙印。

这一时期儒学的沿袭与坚持，玄学的产生和昌炽，以及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在魏晋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政权更替与儒玄思潮的变化	1
第一节 曹氏与司马氏的思想倾向与权力基础	1
一、曹氏家族的出身及思想倾向	1
二、司马氏家族的出身及政治权谋	6
三、曹氏与司马氏的权力基础	9
第二节 曹氏与司马氏的矛盾及高平陵事变的爆发	11
一、曹氏与司马氏的矛盾积累	11
二、高平陵事变的过程	13
三、时人对高平陵事变的预判与分析	16
第三节 司马氏掌权后的思想控制	17
一、司马氏父子的专权	18
二、被杀名士考	21
三、儒学在上层政治的回归	30
第二章 儒玄斗争与文人群体的分野	32
第一节 何晏、王弼与正始玄学的兴起	32
一、“玄”的含义及玄学的起源	32
二、王弼、何晏玄学理论的创立	36
三、正始玄学的衰落	40
第二节 “竹林七贤”与玄学的生活化	44
一、竹林玄学的兴起	44
二、先儒后玄、忧时伤生的阮籍	47
三、内儒外玄、谈玄论理的嵇康	55

四、越礼而重情的竹林名士	63
第三节 钟会、王肃、何曾与儒学的复兴	71
一、钟会与《四本论》	71
二、王肃与经学	74
三、何曾与儒学的虚伪性	74
第三章 儒玄共存与文学主题的丰富	78
第一节 儒中有玄：感时伤乱的悲慨	78
一、应璩《百一诗》中的伤乱之感	79
二、正始文士的感时伤乱	82
三、正始后文士的感时伤乱	87
第二节 儒中有玄：咏史言志的襟怀	93
一、咏史言志类诗歌的发展历史	93
二、阮籍《咏怀诗》中的咏史言志类主题	94
三、魏末其他咏史言志类诗歌	102
第三节 儒玄共存：悼亡恨别的无奈	107
一、悼亡：生死与亲情的表达	108
二、恨别：友情与爱情的歌咏	112
三、音乐：悼亡恨别的载体	125
第四节 玄中有儒：谈玄论道的超脱	127
一、服食养生的追求	128
二、遁世成仙的渴望	132
三、引玄理入诗	139
第五节 玄中有儒：描摹山水的清雅	145
一、前代文学对山水的描写	145
二、以自然景物为意象的阮籍诗	148
三、用自然景物营造玄学意境的嵇康诗	157



四、理性的哲思渗入山水景物之中	162
第四章 儒玄消长与文学体裁的新变	164
第一节 儒玄的相互影响带动了诗的新变	164
一、魏末四言诗的复兴	164
二、魏末乐府诗的雅化	170
第二节 玄风大炽使得论体文成就斐然	178
一、论体文概说	179
二、析理绵密的嵇康论体文	180
三、清谈之风对论体文的影响	183
第三节 玄风影响下魏末小说的创作	185
一、志人小说的先驱：《高士传》《圣贤高士传赞》	185
二、志怪小说的发展成熟：《博物志》	191
结 语	195
附录 “建安又七子”与儒家思想的衰落	197
一、“建安又七子”的人生际遇	197
二、“建安又七子”的政治选择	203
三、“建安又七子”的诗文思想	207
参考文献	215
后 记	219



第一章 政权更替与儒玄思潮的变化

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在曹魏统治的后期是非常血腥和残酷的。而这两大集团的斗争，不仅关涉文人政治命运的起落，也关涉统治思想和社会文化氛围的变化，是影响儒学和玄学消长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节 曹氏与司马氏的思想倾向与权力基础

曹氏与司马氏两大集团，都崇尚权谋，杀伐决断，毫不留情。但是两大家族的出身不同，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也有明显差异，其政权的权力基础也不一样，二者轮流登上政治舞台，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

一、曹氏家族的出身及思想倾向

曹魏集团的创始人是曹操。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他的祖父曹腾，在汉安帝时入宫，经历顺帝、冲帝、质帝、桓帝四位皇帝，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并被封为费亭侯。东汉宦官拥有很大的权力，曹腾便是受益的一个。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养子，因为曹腾的莫大权力，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等高官，后又通过贿赂晋升为太尉，成为东汉政权最高统治集团的一员。

对于曹操来说，出身于宦官家庭，使他较少受到传统礼法的限制，而纵容乃至发展了他无赖的一面。《世说新语》对此多有记载，其中一件事说的是袁绍与曹操少年时抢劫新妇的故事：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追迫自掷出，遂以俱免。（《世说新语·假谲》）

曹操与袁绍的所谓“好为游侠”的行为，其实类似于地痞无赖。而与曹操相比，袁绍尚显得有点木讷，以致经常处于被曹操所戏弄的境地。也许这就是二人日后

政治、军事斗争格局的先兆。《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也记载了一则故事，恰可以说明曹操绝不受儒家思想的困囿，处处表现出“无赖少年”的本性：

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曹操先是“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又不接受叔父的批评，反而施以诈术，使其父不再信任其叔父，这种小聪明确实非平常少年所能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祖于是益得肆意”，表明曹操的品行始终如此，并没有改过自新或者受到节制。但也正是因为他不受儒家礼教约束，所以形成纵肆飞扬的个性，这使他在汉末群雄逐鹿的角逐中很快脱颖而出。

关于时人对曹操的评价，也有两则故事可作佐证。《后汉书》记载：“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许）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而《世说新语》则指类似的话为桥玄所说：“曹公少时见乔（桥）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世说新语·识鉴》）考诸《三国志·魏书》，可以判断“奸贼”与“英雄”之语，确实当出自许劭而非桥玄：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颉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三国志·武帝纪》）

裴松之为这段话作注，就引用了《魏书》，曰：“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由是名声益重。”（《三国志·武帝纪》）可见桥玄对于曹操，确实是极为欣赏，因此不会有“治世之奸贼”的恶评。这当是由许劭的评价误传所致。裴松之又引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



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尝问许子将（劭）：‘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三国志·武帝纪》）此则材料正可以与《后汉书》之语相印证，但是还要注意到两处的具体表述有很大的差异，一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一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语意截然相反，但都是从一正一反两方面对曹操的评价，而非单纯的肯定，这说明曹操的品行和能力并不为汝南世家大族出身的许劭所认可，许劭对曹操的评价言不由衷，仍然有所保留，而并非像桥玄那样予以全面的赞扬。

在地位特殊又富裕的家庭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曹操，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和进入仕途的便利条件，因此，曹操二十岁就被荐举为孝廉，步入仕途。东汉时期对于孝廉的要求是有规定的，阳嘉元年（132）冬十一月“辛卯，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史能笺奏，乃得应选”（《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可见，当时要求必须是四十岁以上的人才能被举荐为孝廉，而曹操二十岁就被破格举荐了。他的特殊出身，使他享有政治上的特权。但宦官家庭的出身，也为他日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因素。

汉灵帝中平六年（189），曹操在陈留起兵，参加了关东军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事。但是直到初平三年（192），曹操做了兖州牧，打败青州的黄巾军，并收服俘虏，建立和扩大了自己的军队，他才真正地拥有了自己的领地，此时的曹操在东汉后期众多军阀当中实力并不突出。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建都许，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这成为曹操事业的转折点。之后曹操剿吕布，平袁术，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建安五年官渡一战，大败袁绍，最终在建安十一年平定冀州、青州、幽州和并州，攻下袁绍的老巢邺城，成为北方真正的霸主。

完成攻城略地的军事行动后，曹操开始将注意力放在政治统治和思想变革上。汉朝从汉武帝开始，采用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思想成为社会和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官员的任用和选拔很大程度上依靠察举征辟制度，这样通经即可致仕，士人走入仕途后，其推荐的人才必然来自于自己的亲朋故旧、门生子侄，于是儒学与仕宦结合，就出现了仕宦大家。这种情形到

东汉就更加突出了，世家大族成了统治集团的支柱。

东汉末期，宦官和外戚往往轮番执掌政权，二者的矛盾此时发展到了顶峰。宦官因为其身份的限制，遭到了士大夫们的排斥；而外戚则招贤纳士，更多地团结士大夫，与宦官们相对抗。宦官家庭出身的曹操，受到了来自官僚士大夫阶层特别是世家大族的排挤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使得曹操不仅在立身处世上多遭物议，而且在招揽英才时也遇到阻碍。《世说新语》载：“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世林既以忤旨见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门，皆独拜床下。其见礼如此。”（《世说新语·方正》）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曹操的出身和品格是不被儒家士子所接受的。

创业之初，曹操就意识到自己的出身会给他带来麻烦，因此他有意地疏远宦官势力，甚至不惜得罪宦官，结交名士，“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以此为基础，曹操为争取士人的认同和支持，做出了种种努力。当初刘备败给吕布，走投无路来投奔曹操时，尽管程昱劝曹操杀了这个强有力的对手，但是曹操为天下计，认为“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国志·武帝纪》）。这是曹操的大略。曹操不仅在行动上结交名士，而且公开宣言：“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飡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三国志·武帝纪》）将自己功业的成功归因于“贤士”的辅助。表现出对世家大族和名士的充分信任与尊重，也因此得到了这些士大夫的信任和帮助。

但是建安十年以后，曹操在势力稳固后，开始施行“破浮华交会之徒”（《后汉书·郑孔荀列传》）的政策，抑制大族、名士的社会政治影响。其选拔标准较之汉代标榜的“以孝治天下”迥然不同。

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求贤令：“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